

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中國境遇



當下，世界秩序處在頗富張力的重建進程之中。這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世界第二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處境。抗拒？順應？另闢蹊徑？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大十字路口。國家明顯處在高度緊張的戰略決斷關頭。

一 二戰後秩序的崩潰

世界秩序的重建，首先從所謂「二戰後秩序」的崩潰中得到事實上的證實。這種崩潰，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其一，美國在重要的國際組織中接連「退群」。美國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的提供者與保障者，這與美國作為二戰盟國的領袖地位直接相關。美國近幾年相繼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CPOA)、《中導條約》(INF Treaty)、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衛生組織(WHO)；加上之前退出的國際組織與協議，美國似乎在主動放棄自己的國際領導權，但其實預埋了重組國際秩序的種子。

其二，曾經給人強烈希望且運轉順暢的超國家組織如歐盟，在英國脫歐之下盡顯疲態。以此為標誌，超國家組織出現一輪明顯的退潮。非盟、南美洲國家聯盟、東盟的聲勢明顯不如從前。退守到傳統國家範圍內行動，似乎成為新一輪國際局勢變化的一個重要現象。

其三，世界兩個大國即美國與中國正展開全面博弈，讓國際社會有些不知所措。曾經是二戰後讓世界秩序得以維持的「中美國」(Chimerica)理念，在中美貿易戰演變為超乎冷戰的全面對壘之際，已經煙消雲散。中美爭鋒，讓新加坡這類國家陷入選邊站的困境，以至於李顯龍不得不為之發表國策講話，並刊文表述國家立場。

其四，世界政治經濟版圖正在發生巨大的改變，二戰後秩序明顯無法有力維持世界秩序。中國GDP的疾速增長是這一改變的主要驅動力，而美國與歐盟的經濟關係重構，則是撬動地緣經濟與政治局勢變化的槓桿。中國的世界地位訴求，成為二戰後秩序崩潰的標誌。中國不再甘願被二戰後美國設定的政經秩序所支配，力圖尋求與國家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二戰後的歐洲一直受美國的戰略庇護，但在冷戰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美國不願再為歐洲安全支付高昂費用。而歐洲已經對此安之若素，不願付出國防代價。因此，歐美關係、尤其是德美關係走低，便在預期之中。



其次，今日世界秩序缺乏有效供給，而曾經的穩定供給者地位受到動搖，且長期享用這一供給的受益方，也對這樣的秩序供給狀態明裏暗裏加以抵制。因此，二戰後秩序受到顛覆，已經讓各國對自己面對的新國際局勢謀劃已久或心照不宣。其中，崛起的中國所提出的世界替代性秩序，如「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成為建構世界新秩序的直接動力。

再次，在二戰後秩序與世界新秩序之間，已經展開了急迫的對弈之舉。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動作頻頻地嘗試建構具有明顯排斥性的新秩序。五眼聯盟(FVEY)的合作被高看，而美歐軸心的再造至少從目前來看不太順暢，主要是德國的響應較為低沉。中國則在自己的世界新秩序方案與二戰後秩序中猶疑：因為二戰後秩序正是中國得以崛起的依託，如何繼續依託這一秩序以保障中國持續發展，構成中國國家戰略應有之思；同時，中國又謀劃能夠為自己帶來更大利益的世界新秩序。這是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理所當然的「政治算術」，但相應也會引起「守成」強國的應急性反應：這讓當今對二戰後秩序本就不滿的美國，加快了世界新秩序建構的步伐，結果必然使兩種剛剛露出苗頭的世界新秩序之間充滿緊張：美國表現出強力捍衛「自由」秩序的意欲，中國堅決表現出維護國家崛起利益的不屈。於是，循貿易戰激化而擴大戰線，中美兩國之間圍繞世界新秩序建構，展開了二戰之後最為驚心動魄的對弈。有人將之命名為「新冷戰」，實際上中美之間豈止正在陷入新冷戰的泥潭？按照美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前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的說法，蘇美之間的冷戰，還只是歐美文化陣營內部之爭；中美之間的競爭，則是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競爭。因此，中美競爭倘若在不可控的情況下全面展開，那將是現代人類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尖銳競爭局面。

今日世界確實在步步陷入失序危機。一是二戰後秩序不再能夠發揮其長期發揮過的秩序整合作用。二是大國間的競爭可能失控，新型「代理人戰爭」已經出現在世人面前，如伊朗不明所以地遭到九輪轟炸、黎巴嫩貝魯特的大

爆炸等等；有人將之解讀為當代戰爭新形態的降臨，有人將之認讀為世界失序的標誌性事件。三是世界新秩序的輪廓尚未展現，世界會不會陷入一個強國、大國各自認定的失序並由此採取國家行動，尚未可知。倘若如此，則無疑會加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二 從舊秩序到新秩序

世界陷於失序狀態，不等於世界不需要秩序。因此，失序的世界只是一個臨時狀態，重建秩序才能讓世界回到常態。目前，世界秩序的重建尚未嶄露輪廓，但一些依稀可見的線索已經呈現出來。五眼聯盟，以及日本申請加入這一聯盟而使之擴展成六眼聯盟，可能是嘗試提供世界新秩序的一個超國家組織。歐盟在繼續崩解與維持發展之間艱難圖存，當德國倡議俄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時，在歐盟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德國，似乎有着謀求大歐洲(包含西歐、中東歐)的國際領導權的意味。五眼聯盟試圖重建的世界秩序，在價值觀、制度導向、生活方式等方面比較明晰。德國以及法國主導的歐盟，可能為了發揮不同於美國的國際領導權，價值主張不夠鮮明、制度訴求不太強烈、多元主張傾向互融。這顯然是兩種世界秩序狀態。在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狀態下凸顯的「中國道路」，開出了建構世界新秩序的第三方方案——「一帶一路」倡議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是其重要支點。

在新的世界秩序萌動之際，舊的世界秩序，也就是二戰後秩序，仍將在一個時期對維護世界秩序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新舊交替的態勢，會讓國際社會的成員感到不適：已經習以為常的舊秩序作用方式走向終結，各國都有點無所適從；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各國都不得不盡力摸索。新的秩序急於掙脫舊的秩序束縛，舊的秩序似乎還纏住新的秩序。凡是在舊秩序的狀態中獲得好處的國家，均會嘗試維護舊秩序，以便獲取舊秩序的剩餘好處；凡是自認在舊秩序中吃虧的國家，均會努力掙脫舊秩序，以便建構有利於自己國家的新秩序。中國屬於前者，美國屬於後者。

中國成為舊國際秩序的得利者，有一個轉變過程。在二戰結束後的三十多年間，由於中國接連陷入國家權力轉移以及階級鬥爭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因此它作為二戰戰勝國，並沒有在國際秩序中獲得好處；加之後來國際站隊時加入蘇聯一方，因此失去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持，陷入了經濟發展遲滯的困境。但在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國搭上了二戰後發達國家建立新秩序的發展快車，因此經濟得以疾速成長。正是由於中國進入了二戰後的發達國家經濟軌道，理性啟動並堅韌維持了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國策，在不斷的政治波動中基本維持住「融入國際經濟大循環」，才較為穩定地獲得了經濟起飛契機。這正是中國面對二戰後秩序受到挑戰的舉動，傾力維護這一秩序的原因；也是中國採取積極舉措進入現行國際秩序、尋求其人員擔任國際

組織重要職位的緣由。但同時，中國自覺不自覺地意識到舊秩序正在走向崩解，因此會在新秩序的建構上着力。

美國自認是舊國際秩序的失落者。在歐洲方面，「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確實對歐洲戰後重建發揮了巨大的推進作用，但美國由此擔負起歐洲的防務重任，讓美國覺得吃了大虧。當歐洲人認為這是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擔負的責任時，美國就更是怒不可遏：如今美國從德國大規模撤軍，就可以讓人看出美國心中嚴重的失落感。在對中國貿易中，美國不僅長期入超，產生大額貿易赤字，而且製造業大量向外轉移，讓美國人一覺醒來，才發現美國製造業的空虛以及對中國的嚴重依賴。尤其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中，在醫療物資上受制於人的慘痛經歷，讓美國認為已經到了非重構國際新秩序不可的地步。

三 世界新秩序與中國自處之道

在國際新舊秩序的轉變中，尚在作用的舊秩序中存在國家間競爭，生成中的新秩序裏也存在國家間競爭，新舊秩序交替中的國家間就更是存在競爭。因此，競爭時時處處存在，並且顯得兼容性匱缺、零和性凸顯。這從中國認定美國不樂見中國崛起的一端得到印證，也從美國以生死存亡看待「自由」秩序的前途與命運得到佐證。在國際新秩序建構中，會出現美中兩方代表的國家集團對峙嗎？這是大概率事件。像新加坡那樣敏銳感知到選邊站的危險的中小國家，絕對不在少數，只不過目前中美之間的博弈尚未走到讓這些國家必須選邊站的極端，因此，夾在中美之間的國家尚有喘息的機會。這樣的契機，會為世界新秩序建構提供一些理性估價的機會，讓中美回到合作的軌道——不是說回到「中美國」的甜蜜歲月，但起碼不要走到全面對抗的悲壯境地，並因此悲劇性地終結二戰後秩序帶給全人類極為寶貴的和平與發展機遇。

國際政治理論的常識告訴我們，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家秩序只有依靠超強國家充任世界警察來維持。這是一個可悲的、但不得不接受的世界政治現實。因此，在國際新舊秩序交替之際，新秩序的供給者必須具有全球眼光、能夠採取全球行動、具有雄厚資源支持其全球干預。倘若在這些方面力不能支，那麼這個國家就很難發揮出建構新秩序的全球領導力。這對中美兩國來說，都存在巨大挑戰。從目前狀況來看，兩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備單挑世界秩序的實力，這就需要國家間的結盟。而國家間的結盟，不僅僅是一個利益選擇問題。其中包含價值觀、制度安排、生活方式、文化習性、教育發展、社會環境等多重因素；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良好意願就可以奏效，而視其國際政治技藝的高低。

由此引導出的問題是，誰能主導新一輪世界秩序的重建？同時，這一輪世界秩序將會指向甚麼樣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國與美國都有人自信自己能夠

主導世界新秩序的建構。不過實際上究竟誰能主導世界秩序的轉變，不靠國家表態，而靠國家聚智聚力的能力高低。比較而言，美國技高一籌。美國在價值觀上以普世價值為號召、在制度安排上以限制權力胡作非為為宗旨、在權力運作目的性上確認公眾導向，並圍繞這些國家支撐點，讓科學技術突破、國家社會互動、教育與人才培養等環節增強適配性，因此其綜合國家力量依然是世界最強的。對此，無論是中國的親美派還是仇美派，都看得很清楚：親美派自然接受美式現代國家模式，仇美派則認為中國必須超越美國才能讓中國在世界上有出頭天。可以說，這兩種態度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在世界新秩序建構中，究竟中美誰能勝出？關鍵就要看他們對人心的有效爭奪、對制度活力的強力激發、對生活動力的有力刺激。總體模式不會是既定的，但在模式之爭中的基本要素讓人們在朦朧中可以辨認、拿捏，並且選擇拒斥與接受的態度。

這與兩個國家自己的發展態勢具有密切關係。中國已經走到一個發展的關鍵時間節點上：進，有希望躋身發達國家；退，被打回發展中國家的原形。此時，國家戰略所具有的應急性，以及在應急條件下是否能做出理性的國家決斷，已經是一個絕頂重要的事情。對內來講，國家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喜不自勝與樂觀未來的情緒蔓延開來，可謂水到渠成，不會讓人驚訝；而對國家理性批評、審慎展望的態度，不受待見，甚至頗受排擠，也在情理之中，不會令人意外。但是，在國家發展的路線上因之出現的嚴重分歧，以及為了維護穩定而對異見的強力壓制，會將國家發展路向問題的必要討論扼制住，國家亟需的聚智聚力，會由此受到顯著不利影響。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出現脆性斷裂，是一個令人高度憂心的問題。其間，國家權力在內政外交舉措上的審慎態度極為重要，任何輕率的舉動，都有可能加劇國家發展的脆斷危機。

目前中國可以說危中有機。這一方面是因為還存在不弱的維護改革開放進路的聲音。儘管這種維護的力量已經非常孱弱，但起碼維護的聲音仍在，這就會讓放棄改革開放政策的人群有所忌憚。改革開放還在繼續扮演權力合法性與統治正當性依據的角色，這讓國家近幾年的極左回潮略微放慢了腳步。另一方面，全力建構世界新秩序的美國，受到內在與外在兩種因素的掣肘。因此，其推進新秩序建構的進度遠沒有想像中那麼快速和如願。中國需要充分意識到美國的強勢與自己的弱勢，從而在建構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戒急用忍，提高技藝，降低調門，尋求實利；尤其需要認真對待英美霸權轉移的歷史經驗，即便要實現中國領導國際社會的雄心，也需要在波瀾不驚的狀態下兌現，而不能輕佻地言說、魯莽地行動。須知，中國積累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的經驗還很緊要，而不顧實力發揮國際領導權，得到的可能僅是「最後一根稻草」。